

關於廣設高中、大學的一些爭論

林文瑛

自從陳水扁市長提出增加高中招生容量一倍，李遠哲院長又主張全面推行新制高中之後，是否該廣設高中、大學再度成為關心教育者熱門的爭論議題。教改會七月份便以「從聯考看分流教育」為題，舉辦了一系列是否該廣設高中、大學的專題討論會，從討論與對話中，亦可窺見學者中壁壘分明、民衆間意見紛歧的縮影圖像。贊成者多半認為，非如此不足以紓解升學壓力、創造正常的教育環境；反對者則認為升學壓力乃文憑主義的產物，廣設高中、大學反會增強文憑主義。然而，有趣的是，贊成與反對的人，常常使用的是相同的語言符號，卻又引伸出南轅北轍的結論。例如，幾乎大家都贊成因材施教、適材適所，都認為教育不應淪為經濟的手段，卻也都指責對方是文憑主義。造成此種現象的唯一理由是，雙方說詞的背後有著不同的假設，因而相同的說詞卻有不同的意涵，因此即使使用同一套邏輯系統，也會得到彼此矛盾的結論。欲釐清此中的混沌論爭，自然也就不能只去檢驗雙方的推論過程是否妥當，而是必須進一步分析論證背後的假設是否合理。

「適材適所」，還是「適所適材」？

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人最常持的理由是，人的性向、能力有別，有人抽象思考能力強，有人具體操作能力強，有人適合唸高中，有人適合學習一技之長，因此應該「因材施教」，才能「適材適所」。具體而言，人是不同類的，因此應該給予不同類的教育，以便擔任適合自己的工作，扮演適合自己的角色。換句話說，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人口中的因材施教，其實只是達成適材適所的手段，而他們的所謂適材適所其實只是為了社會分工而按角色安置人，與公認的教育家（如孔子或杜威）心目中的適材適所概念是截然不同的。教育家談「適材適所」指的是，在人的潛能充分發展之後，為他預備一個能讓他充分發揮所長的环境，而絕非先假設一個人是適合何種位置，

1996.1
4卷1期
教育研究資
頁7~13

然後教育他，使他符合那個位置的角色期待。前者是根據人的發展來決定分工，後者是根據角色分工來決定人的發展，因此，今天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人所說的「因材施教」實在更像「適所適材」，而非「適材適所」。

有一種主張說，不是任何人想唸高中，社會就應該讓他有唸高中的機會。根據以上的論述，作這種主張的人所關心的顯然並不是社會中的個人有沒有機會依照自己的興趣、意願決定自己的發展走向，他們真正擔心的可能是，「如果每個人都唸高中、大學，那麼誰來做清道夫？清道夫是很重要的！」「如果職業教育延至高中之後，那麼基層勞力只好仰賴進口勞工。」換句話說，這些人認為社會分工既是必然而且必要，有些工作因為待遇好、社會地位高，自然是眾人都希望從事的，反過來說，有些工作是除非別無選擇，否則大部份的人都不會想擔任，因此在社會分工的配置上，如果我們不讓某些人及早相信他們除了社會期待於他們的角色外，他們沒有資格要求，也沒有能力勝任他們想要的社會角色，則社會上人人眼高手低、好高騖遠，豈不亂成一團？

這種想法的盲點在於，社會分工固然是必要的，如何分工卻是可以十分有彈性的。例如，如果沒有任何高中或大學畢業生願意去當清道夫，我們的做法不應是限制高中名額，好讓某些人符合清道夫的規格，反倒是應該改善清道夫的待遇與工作環境，以符合一般人要求的工作規格。換一個角度來看，即使很多高中畢業生成為清道夫，情形也不必然悲慘，因為那可能意味著社會分工的漸趨平等，也可能意味著改變環境清掃型態的可能性。總而言之，我們不能認為有些事必須有人做，而自己又不想做，便假設應該有一些比我們差的人為我們去做這些事，同時，還設計一套程序，讓他人的犧牲顯得理所當然，自己的享受犧牲能夠心安理得。在社會分工十分不平等的台灣社會，將高中、大學的升學管道牢牢限制，然後去強調聯考的公平性，便無疑是這麼一套精巧的分類、分工程序。

當然，不論何種社會也許都會有些工作是靠著機械式的反射動作即可完成，但是那種工作的特色正好表現在環境對人的限制上。也許有些人在工作上不得不處於那樣十分受限的環境，然而，辦教育的人卻沒有理由透過教育使人除了工作上的限制外，還受到心智上、人生發展上的限制。換句話說，當我們針對這種貧乏的工作去安排教育時，教育要做的是使人心靈更自由，而不是削人的腳去適合工作的鞋子。談分流教育的人常忘記一件事：他的任務在於啓蒙心智，協助人的成長，既無權也無能力為社會安排分工事宜。當教育者自覺地認定某些學生適當清道夫，因此限制他學習清道夫不必具備

的智能，當是時也，他已經過來說，當教育者不自覺的是教育家，只是為政治人物以及受教育的人，此時，皆誘人的思想陷阱，讓許多人「材適所」，然後以教育作為「想」，令人愉悅。不幸，這，在那個世界裡，人人被「

「因材施教」還是

即使我們都承認有些人高職，因為這樣的觀點反映具體顯現在隨處可聞的說法適合概念學習、有人適合具這些說法毫無根據。因為拓展的複雜程度與運用型態會心與勞力來分辨人的能力是些人在他的環境中發展出較向。根據類似的想法，將人意識型態的簡化思考，試想也用手？工程師不也用腦？學欣賞對一個車床工人是有

人的能力既然在本質上之後，依然無法明白告訴我與他人的綜合印象？智力表在我們對人的「潛能」的理能設定教育目標的做法，根在台灣社會被認為不具唸高需要能力證明的美國社會後而且還是高中資優生！顯然而此，從未聽說他有入學性向些學生學射御，某些學生則教育過程中，孔子會依弟子之

的智能，當是時也，他已經脫離了教育家的角色，自命為先知，充主宰。反過來說，當教育者不自覺的為政治家執行分流教育政策，這時候，他也不再是教育家，只是為政治人物執行社會分配的工具。事實上，他與教育本身，以及受教育的人，此時，皆成了達成政治目標的工具。人類史上，一直有個誘人的思想陷阱，讓許多人不知不覺的相信，當社會經過規劃，使人人「適材適所」，然後以教育作為手段，來落實這種規劃，整個社會便會趨於「理想」，令人愉悅。不幸，這樣的烏托邦事實上更接近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人人被「打造」的適材適所，只是活得全無意義。

「因材施教」還是「選材施教」？

即使我們都承認有些人並不適合唸高中，但也絕不表示那些人就適合唸高職，因為這樣的觀點反映的是，人只有兩類，教育也只有兩種。這種觀點具體顯現在隨處可聞的說法裏：「有人適合動腦，有人適合動手」、「有人適合概念學習、有人適合具體操作」，然而，近代心理學的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說法毫無根據。因為抽象思考能力似乎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只是其發展的複雜程度與運用型態會隨著個人與環境的互動而變化，換句話說，以勞心與勞力來分辨人的能力是沒有道理的。這種分辨的真正義理常只是：，有些人在他的環境中發展出較多的勞心傾向，另一些人則發展出較多的勞力傾向。根據類似的想法，將人的工作分為勞心、勞力其實也是根植於垂直分工意識型態的簡化思考，試想：醫師不也動手？運動選手不也動腦？藝術家不也用手？工程師不也用腦？為什麼清道夫不能也學會哲學思考？憑什麼說文學欣賞對一個車床工人是有害的？

人的能力既然在本質上是無法分類的，而心理學在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之後，依然無法明白告訴我們，智力是一種實體，還是一種人的各種表現給與他人的綜合印象？智力表現反映的是天賦，還是環境的影響？也就是說，在我們對人的「潛能」的理解還十分有限的今天，試圖將人分類並根據其潛能設定教育目標的做法，根本只是草率的嘗試錯誤罷了。最明白的例子是，在台灣社會被認為不具唸高中能力的挫敗的國中生，到了一個唸高中近乎不需要能力證明的美國社會後，卻常能屢創奇蹟，證明自己不僅有能力上高中，而且還是高中資優生！顯然孔老夫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從未聽說他有入學性向測驗，然後視測驗成績指定某些學生學禮樂，某些學生學射御，某些學生則學書數，他是一體給一樣的六藝教育。只是在教育過程中，孔子會依弟子之資質、性向、表現而給予不同的誘導方式，以期

達到最大的教育效果。換句話說，從孔子的角度來看，所謂「因材施教」指的是，施教者對受教者的反應與接受程度保有最大程度的敏感，能隨時調整自己的教法，使之最適合受教者的需要，而絕非指施教前將受教者加以分類與鑑別。

凡此種種，其實都只證明了一件事：人是無法以一個單一指標加以分類的，我們要不就承認人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要不就得承認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若想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也只能有兩個思考方向：一個是，什麼樣的教育環境對所有人的發展都是最有利的；一個是，如何配合每一個人的發展需求，提供最豐富的环境條件。在實務上，前者是課程與學校規畫，後者是師生互動。根據這樣的道理，我們便能明白為什麼先進國家在規畫課程時，都只規畫核心課程，而非標準課程，規畫學校時也儘量鼓勵不同型態學校的產生，至於發展心理學、兒童心理學、青少年心理學為什麼是師資培育的核心課程，當更不在話下了。換句話說，所謂「因材施教」的關鍵其實是，在教育過程中保持彈性，以確保個人的發展空間，而不在施教前能否精確地鑑別學生。

再從實證證據來看，許多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的高中生、大學生以來自中上階級的家庭居多，清楚驗證了再嚴苛的篩選亦無法保證「分類」的精確，只會更加強化環境對人的限制，使得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因此，如果「因材施教」不是口號，不是限制個人受教育機會的藉口，而是真正為了配合個人發展上的差異與需要，那麼高級中等學校便不應該只分成高中、高職兩類，真正需要的是許許多多不同取向、不同課程規畫的學校。換句話說，唯有多元課程取向的學校概念才有可能真正落實因材施教的理想；現在這種限制高中、大學容量的做法只是「選」材施教，「選」少數人接受有機會成為社會菁英的教育，至於這種教育是不是也對其他的人有利，或是不是其他的人只適合唸高職，便不是擁護「分流教育政策」的人關心的重點了。

誰是文憑主義的幫凶？

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人認為，現在的升學壓力是因為一些不適合唸高中、大學的人也要去擠高中、大學的窄門而製造出來的，因此若是再廣設高中、大學，無異強化高中、大學的價值，使得很多人將更盲目地去追求高中、大學的文憑，形成更嚴重的文憑主義。當升學競爭因僧多粥少而惡化時，這些說法聽來誠然振振有詞，然而如果允許做更細緻的檢視，事實上台灣社會之所以文憑主義盛行，也許不是基於對獲得文憑的教育過程的肯定，而是基

於文憑「限量發行」的稀少一等、與眾不同，從而享有更多的人去競爭有限的文憑，而是在於文憑稀少所創造出讓文憑的價值回歸市場的自稱的價值。這樣看來，所謂「不夠格」的人硬擠升學的，為什麼硬要讓多數人以「不與特殊？」

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主義的根本之道。不幸，證不過是創造另一種身分指標初無二致，後果則是使得職業去保障人的後續發展或出人是學力認定，證照便是技能下，證照便只能屈於二等文憑主義。根據同樣的道理身教育的管道，便能讓人樂方來說，這種教育設計猶如其實很難說出個道理來。終人在一生中隨時得以尋求教高中大學，以築起年輕人接教育，只怕是思想上的混淆

最叫人無法理解的是，主義，而指責別人文憑主義一理由是：只有夠資格的人主義，而那些不夠格卻又想「學歷病」、「文憑主義」指一部份人的沒有自知之明勢，作社會體制的調適，而

教育投資與社會成本

教育資源有限亦是反對

於文憑「限量發行」的稀少性，唯其限量發行，捷足先登者自然被視為高人一等、與眾不同，從而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較好的發展機會，於是又激發更多的人去競爭有限的文憑。也就是說，文憑主義的根源並非對文憑的迷信，而是在於文憑稀少所創造出來的附加價值，因此除非打破文憑的限量發行，讓文憑的價值回歸市場的自由評價，否則文憑就會因著篩選效應而具有不相稱的價值。這樣看來，所謂「文憑主義」的關鍵，似乎不在於許多被視為「不夠格」的人硬擠升學的窄門，倒是在於為什麼只有這麼少的人「夠格」，為什麼硬要讓多數人以「不夠格」的身份去彰顯少數人十分可疑的「優越」與特殊？

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人又常主張落實證照制度，認為這才是消除文憑主義的根本之道。不幸，證照本身正是另一種型態的文憑，證照制度想做的不過是創造另一種身分指標，以資和文憑指標相抗衡，他的精神和文憑主義初無二致，後果則是使得職業教育更像職業訓練。以文憑或證照作「入場券」去保障人的後續發展或出人頭地機會，不正是文憑之所以誘人處嗎？若文憑是學力認定，證照便是技能認定，本質上並無差異。在文憑限量發行的情況下，證照便只能屈於二等文憑的位置，仍然無法根除文憑主義，甚至會增強文憑主義。根據同樣的道理，有些反對增設高中、大學者認為，只要擴充終身教育的管道，便能讓人樂意去唸高職，也是十分不切實際的想法，打個比方來說，這種教育設計猶如只准某些人搭直達車，其他人就得轉了又轉車，其實很難說出個道理來。終身教育的精神在突破人與學校教育的藩籬，使得人在一生中隨時得以尋求教育，不會遇到障礙。這樣看來，一方面反對廣設高中大學，以築起年輕人接受高中、大學教育的藩籬，另一方面卻鼓吹終身教育，只怕是思想上的混淆。

最叫人無法理解的是，很多人只是想拿個高中、大學文憑就被指為文憑主義，而指責別人文憑主義者通常自己都擁有高學位。能解釋此種現象的唯一理由是：只有夠資格的人想唸高中、大學，甚至拿碩士、博士都不是文憑主義，而那些不夠格卻又想唸高中、大學的人才是文憑主義。在國外，所謂「學歷病」、「文憑主義」指的是社會趨勢，一般風氣，只有在台灣，它是指一部份人的沒有自知之明，因此它的解決辦法便不會是如國外那般順應趨勢，作社會體制的調適，而是想辦法讓人認份。

教育投資與社會成本

教育資源有限亦是反對廣設高中、大學者常舉的理由之一，但是這樣的

說法其實有幾個盲點：第一，由於國中升學機會超過 100%，因此只要將現有的高職改為高中，增加的教育投資其實十分有限；第二，教育投資其實是社會資源的累積，而不是社會資源的耗用，任何人多受教育，對社會、對個人都有益處；第三，強制分流所帶來的升學競爭，使得全社會付出遠比增設高中、大學更高的社會成本。這些社會成本包括了國中生的健康、教育系統的扭曲、人才供需規劃的誤差、階級複製，與零和競爭所造成的惡質社會。光就財務面來加以檢視，就會知道限制高中容量是多麼得不償失的做法。以台北縣、市為例，今天如果增加高中的招生容量，使得另外百分之二十五的國中生得以升入公立高中，則北區聯招的錄取率即可由目前的 26% 增加到 66%，對於升學壓力的緩解必有很大的助益。如果這些增加錄取的學生，一如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人所說的，他們接受高中教育是浪費的，再假設浪費的額度為投資於他們身上的教育經費之一半，則「浪費」掉的教育經費不過約 24 億台幣。相對於此，如果維持現有的高中比例，在升學競爭不斷惡化下，學生家長所付出的財務代價，單只計算補習費、增加近視人口所增加的配眼鏡費用、購買升學參考書的錢、落榜後國四班的補習費，以及考入五專，畢業後試圖插班大學的補習費，每年社會在這些方面多付出的就高達 163 億。因此，以社會成本來反對廣設高中、大學，基本上亦是無法令人心服的理由。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高中、大學

從教育投資的角度來看問題，最能明白顯示，今天的爭論全然不在「投資」的額度，而在投資的類型。如果我們要更省錢，那麼高中與文科大学要遠比高職與技術學院省得多；證據也顯示，前者的畢業生經過短期職業訓練後，並不比後者更缺乏「生產力」。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同樣的教育「投資」，要投入到那一類的學校對社會與個人更有利。於是一個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我們可以有那幾類可能的學校？過去這些年來，關於廣設高中、大學的爭論的一個廣泛誤解是，許多人以為，廣設高中的結果是使高級中學階段只剩下一種學校——即現在的那種高中。事實上，今天的教育問題有一大部份是來自於這種「套模子」的教育觀，使廣設高中大學的爭議成為一個模子對兩個模子之爭。這個現象正好可以說明教育為什麼老是帶有「迫人就範」的性質，僵化的分流教育竟然也被指為講究彈性的「因材施教」。廣設高中大學，既稱「廣設」，它就代表一種新的嘗試，要能用一種可以適合社會普遍需要的新概念去辦學校，才廣得起來。換句話說，廣設高中大學其實會帶來一種新的契機，乃至於新的社會壓力，讓我們重新檢討，社會需要怎

樣的「高級中等教育」與「
顯得十分可笑。

林文瑛，現任輔仁大學
員會研究組組長

樣的「高級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想明白了這些，今天的爭議也許就顯得十分可笑。

林文瑛，現任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教授、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研究組組長